



“融·变——南涅水石刻艺术展”上的石刻文物

“融·变——南涅水石刻艺术展”正在山西博物院会展中心展出。展览汇集200余件跨越北魏至北宋的珍贵石刻文物，让观众在刀凿痕迹间，读懂佛教艺术中国化的漫长旅程。

1957年至1959年，山西沁县南涅水村寡塔遗址的偶然发掘，让800余件石刻文物破土而出，包括四面造像塔构件、碑刻、单体造像等，时代序列完整地覆盖了北魏至北宋的五百余年光阴。这片坐落于涅水南岸的土地，曾是北魏平城到洛阳、东魏北齐邺城到晋阳交通线上的重要节点，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多民族文化交融的走廊，也为佛教艺术的生根发芽提供了土壤。这些石刻并非深山崖壁上的石窟造像，而是因地制宜、就地取材的民间艺术珍品，可组合移动的造像塔、形制各异的单体造像，既不同于云冈石窟的雄浑，也有别于龙门石窟的规整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“晋东南样式”。

展览的“万象”单元，生动诠释了佛教与世俗生活的深度融合。造像塔的石面上，佛传故事与百戏杂耍、农耕场景交相辉映，宗教叙事中融入了浓郁的生活气息。北魏后期的造像已初见融合端倪，佛像身着褒衣博带式袈裟，衣褶垂覆于台座，衣纹叠涩，面相丰满却眼帘低垂，带着沉思的安详，莲花瓣似的嘴唇微翘，浮现出穿越千年的微笑。而在一些造像基座上，浮雕的市井图景细致入微，有官吏礼佛的庄重，有民众嬉戏的欢腾，甚至能看到孩童佩戴的饰物细节，这些生活化的刻画，让冰冷的石头有了温度，也印证了佛教信仰在社会各阶层的普及。更令人称奇的是，部分造像碑中还出现了道教题材与儒家伦理相关的元素，儒释道三教融合的社会思潮在方寸石面上清晰可见。

“更新”单元则铺展开一幅清晰的艺术演变画卷，让“变”的轨迹一目了然。北魏时期的造像带着“秀骨清像”的神性庄严，高鼻深目的异域特征尚未完全褪去，却已在眉眼间透出中原审美；北齐造像则呈现出“薄衣贴体”的独特质感，佛像磨光高肉髻，面相方圆，细眉大眼，高鼻薄唇，曾经的雅利安人面型已逐渐被北方民族的面相替代，袒胸服饰也被褒衣博带所取代，雕刻技法上写实与浪漫高度结合，菩提树叶纹端庄秀美，清俊飘逸；到了唐代，造像则转向“丰腴健美”的温婉世俗，菩萨面型清秀，长颈窄肩，身材修长，飞天伎乐长裙飘逸，轻盈潇洒，尽显盛唐的雍容气度。这些风格的更迭，不仅是审美趣味的变化，更是佛教艺术不断适应中国社会、实现文化本土化的过程，每一次细微的调整，都镌刻着文明交融的印记。

最具艺术特色的造像塔，是南涅水石刻的精髓所在。这些塔形造像由五节或七节方石叠垒而成，自下而上逐渐收分，呈方柱形，每层石块四面开龕，雕刻着佛、弟子、菩萨、火焰纹等图案，组合起来便是一座完整的佛塔，拆分后又可独立观赏。北齐时期的“背光式”造像碑尤为独特，以主尊佛像为中心，背部雕刻火焰纹或忍冬纹背光，外侧环绕多层浮雕故事，下部基座刻有伎乐天、供养人及题记，构图紧凑有序，纹饰繁简得当。造像塔上的龙首装饰更是变化多端，有的垂首汲取，有的昂首欲飞，有的怒欲吞云，有的嬉戏吐雾，同一题材却演绎出万千姿态。而那些纪年碑刻，不仅为断代研究提供了确切依据，其书法风格从北魏的雄健豪放向东魏北齐的秀逸洒脱转变，更客观记录了汉字书体演变的轨迹，成为书法史研究的珍贵资料。

在“汇流”单元，南涅水石刻的历史价值得以升华。这批石刻艺术受到云冈、龙门等皇家造像工程的影响，一脉相承又独具个性。从北魏到北宋，朝代更迭、社会变革，而石刻艺术的创作从未中断，805件（组）文物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艺术体系，成为五世纪以来佛教艺术中国化的重要见证。北宋时期，寺庙僧人与信众将这些石刻集中掩埋，这一偶然的举措使得它们跨越千年风雨得以保存。

南涅水石刻艺术展的意义，不仅在于展示一批珍贵文物，更在于让我们通过这些沉默的石头，读懂融合与变革是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。



## 冬日里的一抹红

文悦



冬红(资料图)

冬日的植物园，草木大多褪去浓妆，唯有松柏坚韧地擎着一身苍翠。漫步在铺满落叶的小径，冷风掠过耳畔，忽然一抹亮眼的红撞入眼底——这就是冬红。

冬红是唇形科属常绿灌木。冬红冬季开花，红艳似火，其苞片在花凋谢后还能长久保持红色，故得名“冬红”。其花冠包藏于扩大的花萼内，花萼成碟状，因此冬红有“洋伞花”“帽子花”的别称。当冬红的花冠筒凋落以后，花萼仍然能够在枝头宿存，这一时期的冬红看上去和我们用来遮阳挡雨的斗笠有几分相似。而“斗笠”中间绿色深裂的小圆粒，就是冬红的果实。

冬红原产喜马拉雅南部地区，现我国广东、广西、福建、云南等地多有栽培。明代书画家彭睿，是广东顺德人，其诗《村中看红叶作》有诗句提到冬红：“树亦令人艳，冬红始见奇。叶为诗者色，霜乃画之师。”当北方已是万物凋零之际，南方这亮眼的“冬日里的一抹红”，却为诗人带来了一份独特的审美意趣。

冬红为强阳性灌木，喜阳光充足的环境，适宜种植于透水性较好、腐殖质较多的土壤。冬红株形优美，萼片形态奇特，观赏价值很高，用途广泛。常植于景区公园、城市绿地、庭院等处，也是高端花材，可用作插花素材，烘托出喜庆场合的火红热烈。此外，冬红的不同部位蕴藏着不俗的药用潜力，兼具止痛、消炎、利尿以及抗真菌的功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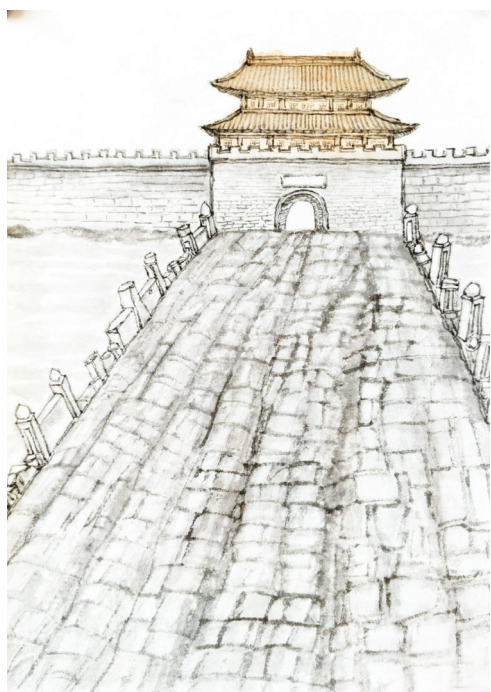
从装点园景的观赏花卉，到暗藏药用价值的植物宝藏，冬红在冬日里书写着属于自己的双重精彩。

# 石语千年 融变共生

邢占平



状物



镇远桥遗址

籍云燕 绘



状物

## “抚绥全晋”牌坊

胡春良

太原府西街鼓楼广场上有一座牌坊，造型精美、雕饰华丽。牌坊正面书“抚绥全晋”，背后书“文武为宪”。牌坊背后是一座砖混影壁。

据《山西通志》载，此地原有牌坊三座，东为“抚绥八郡”坊、西为“提督三关”坊、中为“保厘重任”坊，后中坊改书“文武为宪”。经查阅资料，“文武为宪”牌坊建造于明宣德三年（1428）。1933年，山西督军府改建牌坊并重新修缮，题字为“抚绥全晋”。1952年三座牌坊均被拆除。

2013年，府西街改扩建，重建中坊一座，即我们现在见到的“抚绥全晋”牌坊，另外两座牌坊并未复建。

据说，“抚绥全晋”四字是东晋大将刘琨说的。“抚绥”，是安抚、安定的意思；“全晋”就是整个山西的意思，即安抚整个山西的美好愿望。“文武为宪”字面解释为“文章和武艺都值得效法”，出自《诗经·小雅·六月》：“文武吉甫，万邦为宪。”其中，“吉甫”指的是西周太师尹吉甫（“尹”是官名，商代及西周时为辅弼之长官）。这句话是赞誉尹吉甫文武双全，他的文

才和武艺都能够成为万邦的楷模和典范。

那么刘琨又是怎样一个人呢？经查阅有关史料，刘琨（271—318），字越石，中山魏昌（今河北无极县）人，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，光禄大夫刘蕃之子，是西晋政治家、文学家、音乐家和军事家。西晋永嘉元年（307），刘琨被任命为并州刺史，加振威将军，领匈奴中郎将。刘琨在赴任途中上表朝廷，称自己遇到胡寇堵路，几次以少胜多，历经艰险，途中所见百姓流离失所，十不存一，尸横遍野，四周山间都是胡人劫匪，自己困守孤城。并州（今山西太原）南通河内（今河南沁阳）、东连司州（今属河南）、冀州（今河北衡水）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，请求朝廷迅速支援五百万斛粮食、五百万匹绢、五百万斤棉。朝廷同意刘琨的请求。刘琨在任不到一年，流离的百姓逐渐回归，并州恢复了生气。可以说“抚绥全晋”不仅寄托了刘琨的政治抱负，也彰显了他在并州积极推动生产、施行有效治理的卓越实践。

欣逢盛世，山河壮丽，一座牌坊不仅见证了时代更替变迁，也是太原文脉中的别样锦绣。